



何为共产党人的奋斗本色

——读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 张 天 李胜凯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一文是由毛泽东 1957 年 3 月 18 日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和 3 月 20 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而组成，后经整理被收录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整篇文章围绕“发扬艰苦奋斗与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传统”为主题，号召全党同志继续发扬党的革命优良作风，彰显共产党人的奋斗本色，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在我们党建党百年之际，重温这篇文章，对党员干部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不畏艰险、锐意进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奋勇前进，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我们党从建立之日起，就继承并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使之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在讲话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指出：“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相比起革命战争时期，党和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拚命精神少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因此，毛泽东强调要通过整风将这种思想扭转过来。他引用《林冲夜奔》中“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这句唱词来批评党内部分领导干部为了个人利益损失而伤心哭泣的做法，并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只有到了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弹几滴眼泪”。毛泽东还指出：“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

始终为人民群众利益而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取向。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00 年来，为了人民的利益，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和代价，承受多大的压力与挑战，我们党都始终不渝地坚守。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根本目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指出：“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始终能够得到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的根本原因。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

工作路线，它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历史与实践已经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党的既定目标和伟大事业才能实现。党员干部更要带好头，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到为党的既定目标而奋斗，为人民而奋斗，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

“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拚命精神”。革命是共产党人奋斗的底色，革命热情是共产党人奋斗的精神特质，拚命精神则是革命热情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讲“革命热情”与“拚命精神”就是指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热情，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拚命精神。毛泽东指出：“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九十岁，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少多少应当工作。”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使得党内少数党员干部丧失了革命热情和拚命精神。如新中国成立后的腐败“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在胜利面前迷失了自我，在和平的环境中忘记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刘青山甚至说道：“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啦，老子该享受享受啦！”面对党内日益滋生的不良风气，毛泽东认为，“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毛泽东以军队的政治工作为例来阐释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他指出：“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这时候，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他认为：“群众是公道的，他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军队，我们共产党人开展任何工作都应紧密团结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扬民主、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奋斗的根本目的与动力源泉。

“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人民群众标准始终是衡量共产党人奋斗的最高标准。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工作做的好坏，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人民群众说了算；工作得不到认可，不是靠资格高低，靠的是为人民群众解决问题的能力。毛泽东在讲话中就指出：“说资格老，多少年革命，这个资格也是可靠的，但同时我们不要靠它。”原因就在于：“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一些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

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是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指向，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办事能力是共产党人奋斗的前提保障。毛泽东认为，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而不是“靠老资格吃饭”，“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在毛泽东看来，党员干部要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锻造自己的政治能力，以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难事、大事来赢得上下级的敬佩和人民群众的尊重。要靠实力、能力赢得尊重，而不是靠资格、官级。同时，毛泽东还要求“老干部对新干部要处在平等的地位”，很多新鲜的东西要向年轻干部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深刻铭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百年艰辛历程，发扬为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全党必须始终发扬“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革命优良传统，发扬“三牛”精神，永葆共产党人奋斗本色。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 年第 2 期聚焦

充分发挥新型政党制度效能

□ 吕红娟



充分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新时代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 年第 2 期聚焦“充分发挥新型政党制度效能”，邀请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深入探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建立在近代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反独裁反专制斗争实践基础上的，是我国历史演进和人民选择的结果。甘肃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欧阳坚在《新型政党制度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中回顾了新型政党制度演进过程并指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萌芽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发展于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年代，成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假以时日，必将更加健全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广泛的代表性、高度的整合性和严格的规范性，为中国的平稳转型、有序发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政治保障。人民政协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重



陈寅恪（1890—1969 年），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国学大师，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他自幼博览群书、学贯中西，毕生钻研史学要义尤其是中古史，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涅槃重生，他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纵览陈寅恪的治学生涯，其中所含的治学追求、原则、方法、特色等，是一笔内涵丰富的宝藏，在倡导“文化自信”的今天，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

治学追求：救国经世，不忘本来。陈寅恪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在清末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种为国为民的精神，伴随着家庭熏陶印刻在陈寅恪心中。一如在抗战之中，陈寅恪为了鼓励振奋国民，“不能不有所撰述”，由此撰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名作。为挽救中华文明，他认为技术、实业、军事等，确可以作出贡献，但归根究底，还是在于革新文化。他指出：“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一生致力于中古史的研究，可能主要是基于此考虑，因为从南北朝到隋唐，当时确实是一个中外交流频繁、中华文明不断注入新元素，并攀新高峰的过程。而此番治学过程，也让他确认令中华文明与他者相区别的，“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假若学者都未在文化上保持自觉、自信，那更不可“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故而，如今之治学，当更应注重以文化自信为根本的“四个自信”，外来先进事物的确可取，却莫忘记归根究底还是服务于中华文明自身。

治学原则：惟偏蔽之务去，真理之是从。为了更好探寻中华文化，陈寅恪选择终身从事史学研究。因为只要一个国家的历史留存，那它所承载的记忆与文化，自然可以激励后世奋发图强、再创辉煌。既然治学历史，那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无疑为陈寅恪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陈寅恪主张治学必考异求真。在史料选择上，陈寅恪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

要机构和载体，加强其协商民主建设正是新型政党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职责所系、时代所需。

2018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新就新在”深刻阐明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点和独特优势，为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邹晓东在《怎样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新”》中，从四方面阐释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新”：一是创造了崭新的民主形式，充分彰显了人民民主的广泛性和有效性，开辟了世界民主发展的新境界；二是创造了崭新的政党关系，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是一种团结、合作、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三是创造了崭新的利益表达方式，能够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妥善协调各方面关系、充分吸收社会各方面意见，从而保证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四是创造了崭新的执政方式，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处于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高。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个制度还是两个制度？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刘佳义在《我国政党制度中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予以回答：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保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是多党合作，运行的基本方式是政治协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同属于并共同构成这一完整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协作

惟偏蔽之务去

——陈寅恪的治学之道

□ 孟 飞 彭昱剑

以研求问题，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为此他广泛阅读，并自学了几十种语言。他的学生陈哲三回忆陈寅恪研究清史，就是一本一本地翻阅满文档案。在史料辨析上，陈寅恪曾道：“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种对于材料的旁征博引，可以一事为证：在对《大乘稻圣经随听疏跋》一篇跋文的研究中，陈寅恪不仅研究了蒙文、梵文、藏文、中文之间的翻译，而且借鉴了法、德、日等国学者的成果，不可不谓全始全终。倘若面对材料不足的情况，陈寅恪不会轻易定论。例如在研究唐代俸禄时，曾解释“唐代官俸随时随地互不相同，今存史料，殊不完具，不易知其详实数额。故所依据以推测者，亦不敢自信以为定说”。由此观之，现今治学，尤其是人文社科，既要功夫扎实，能够掌握充分材料，也要学问渊博，考辨材料之异同。同时，最重要的严谨求真不能丢掉。

治学方法：了解之同情。当手中掌握诸多材料并逐一辨析后，又该如何治学？陈寅恪认为，当采取“了解之同情”。原因在于，当时的部分学者治学，不仅材料不足、轻易结论，而且更是未经系统完整地研读，就基于自己的学说与经历妄做文章。陈寅恪对此强烈批评：“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因此在史学研究中，一方面要尽可能掌握足够真实的材料，更全面地了解古人古事，乃至如像艺术家欣赏雕刻绘画那样去钻研；另一方面则要返回历史的“事发现场”，尽可能融入与古人同一的立场、情景、境界中，去感同身受。而这种“同情”，不仅仅是基于对具体个人的阐发，更是为了着眼当时整个社会背景与动向。例如，在唐高宗“废王立武”一事上，就看出该事件不单是后宫争宠，对关陇集团的敲打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又如对于刘裕称帝，传统看来这不过是谋朝篡位，而陈寅恪指出这是“阶级已起变化”。可以说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既运

用了史料的佐证价值，又发挥了基于此的推断与想象力，最终铸就一系列妙手文章，不可不谓主客观的精妙结合。这也启示当下，有一部分材料固然要说一分话，但也可基于科学推测，大胆假设而后小心论证，能在学术创新上有所突破。

治学特色：以诗证史，以史释诗。中国近现代涌现出不少史学大家，而陈寅恪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乃是其特色鲜明。他自幼饱读诗书，常在治学之余作些诗词以抒胸臆。这份功力，表明陈寅恪的古典文化深厚，也从侧面反映出其涉猎广泛。例如，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陈寅恪就曾广泛运用古代的笔记小说，据今人统计近 60 处、20 余种之多。而对于文化瑰宝唐诗，陈寅恪不仅点出其文学价值，更是认为“可补充唐史料的缺乏”。因为在他看来，“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诗文中除却涉及典故的“古典”外，还有作品成型时所涉及史实的“今典”。这份今典经过“了解之同情”后，能折射出时人心态与社会流变。例如在《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寅恪通过对元白二人诗歌的探微，阐释了一系列晚唐的社会风习，并重点指明科举制度对于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在《柳如是别传》中，又以明清易鼎的大背景，梳理了暗藏在诗文中士大夫的心路历程与情感转变。而对此书的评价，陈寅恪也自称是“忽庄忽谐，亦文亦史”，他对文史材料之驾驭，已是炉火纯青。尤其是书中语言，合乎逻辑的同时，也运用古朴的风格透露出美学意蕴。现今细品该书，那种在信息时代不可多得的古风古韵，也是扑面而来。这启示我们，学界中大家的追求、原则与方法可以一致，但在特色上却要百花齐放。这样不仅有利于学人自身发展，也益于各学科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从追求、原则、方法到特色，可以说陈寅恪的治学之道，诠释了“知行合一”。他不仅毕生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涅槃重生，而且将这种精神化为文章学问，处处彰显着民族文化魅力。

室工作人员到浙江来找我，习书记专门请他吃饭聊家常，一点也不敷衍。那一次我们也坐在旁边，习书记的诚恳待人、平易近人，让我很受感动也很受教育。

2007 年，习书记离开浙江去上海工作，浙江的干部都十分不舍。这种不舍，源于大家对他由衷的钦佩和敬仰。他以高超的智慧和高远的谋划，带领浙江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转型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今天，每当看到总书记在中央层面推出一项项改革措施，并且从顶层设计到推进方案一步步抓在实处、干在实处，我们心中都坚信，他一定能够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上接 5 版）

还有一次，2006 年 3 月，我刚从政研室调到办公厅工作，习书记把省委秘书长、我，还有几个相关同志叫去开会，交代我们在全国两会期间要组织办公厅干部下去搞调查研究，主要了解省委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下面有什么反映和建议，落实当中还有什么问题等。我们分明察、暗访两方面人员，每个市一个组，大约五六十人，所有调研费用全部拿回办公厅报销，不准由基层“买单”。这一次调研，我们写了 1 个总报告、13 个分报告，共 9 万字，习书记看得非常仔细，每份报告上他不仅划出很多重点语句，而且还在空白处作批注。办公厅督查室把这些内容都作了梳理，根据内容类别

分解到各个部门去落实。从 2006 年开始，每年全国两会期间省委办公厅都会组织干部下去调研，一直坚持到现在。

三是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习书记很重视群众意见，总是尽最大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这和他任七年知青岁月中与基层百姓培养出的深厚感情有很大关系。2003 年，习书记要求建立为民办实事的长效机制，先是亲自主持到基层调研，随后省委专门发文件，规定党委政府每年要做 10 个方面的民生实事。从 2004 年省两会开始，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每年要办 10 大民生实事。这 10 大民生实事，一开始是政府根据调研情况安排的，后来根据征求的

群众意见安排，并在次年两会上，省政府要就这 10 大民生实事进展情况，向省人代会报告。这个制度也一直坚持到现在，推动了很大一批百姓民生问题的解决。

浙江台风灾害多发，习书记来了以后，反复强调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最重要，抗台工作要以“不死人、少伤人”为原则。安排群众转移时，普通老百姓都有故土难离的思想，又舍不得放弃家里的财产，有的老百姓拽着自家的房门，怎么都不肯走。习书记常说，宁愿听老百姓的骂声，也不要听老百姓的哭声，必须尽一切办法做好灾区群众转移工作。这也充分体现了他真正把老百姓放在心上。